

鲁迅的最后十年

林贤治 著

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出版集团

在中国再没有第二个像他（鲁迅）这样对奴性——奴才性和奴隶性——施行如此猛烈的攻击了。可以说，反抗，是鲁迅哲学的核心概念。



鲁迅的最后十年

林贤治 著



东方出版中心
中国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的最后十年/林贤治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06. 1

ISBN 7 - 80186 - 411 - 5

I. 鲁... II. 林... III. 鲁迅(1881 ~ 1936) - 生平
事迹 IV. 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5204 号

策划编辑 李又顺
责任编辑 陈晶茹
装帧设计 王小阳

鲁迅的最后十年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25 千

印 张: 11.25 插页 2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186 - 411 - 5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

鲁迅原名周树人，于1881年10月诞生于浙江绍兴。这是一个古城，傍水居筑，风景佳丽，有东方威尼斯之称。

引 言

鲁迅死于 20 世纪而活在 21 世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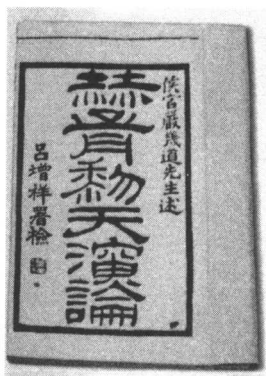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。然而，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，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；与其说，他带来的是“欣慰的纪念”，凯旋门，缤纷的花束，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，断裂的盾，漫天无花的蔷薇。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，它博大，沉重，燃烧般的富于刺激，使人因深刻而受伤，痛楚，觉醒，甘于带着流血脚踵奋力前行。

1881 年。鲁迅出生的年头，正好临近帝国的悬崖，是时间的断裂带。中国现代化，在民族的屈辱中蹒跚起步，许多陌生的事物，陆续出现在大队蠕动着辫子和小脚之间。随着经济的萌动，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——戊戌变法——旋起旋灭，蒙受血光之灾。中国向何处去？成为横亘在官员、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的问题。

汉学家费正清用“沿海中国”和“内陆中国”的概念，阐述中国近代的两大传统。鲁迅的出生地，恰恰落在沿海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：绍兴。它是古老的，又是年轻的；它是越王报仇雪耻的故地，又是新书报最早流布的地方。在它四周，毗连大小村落，具有明显的边缘色彩。

鲁迅的大家庭过早败落，对应于古老中国的命运，很有点同构的意味。由于祖父下狱事件的牵连，他曾经在乡下度过一段短暂的“乞食者”生活。祖父被判“监斩候”，由最高统治者于顷刻间的“钦点”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，这是荒谬的，但是又是天经地义的。权力的这种不测之威，使他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，耻辱和仇恨所抓攫。父亲的长期卧病和后来的亡故，无疑加剧了他的精神创痛；而作为长男，又不得不从中担当沉重的责任。家庭的两次变故，把他无情地推落到社会底层；从小康而入困顿，终致自我放逐，远走异乡，“把灵魂卖给鬼子”。生活的巨大落差，构成了他日后反抗现存秩序的广阔而深刻的背景。

可以说，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，来自现代的源头，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，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，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粗糙的摩擦面。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，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，带有某种“原型”性质。由于改革的缓慢，在一个长时段内，前前后后会产生许多彼此类似甚至雷同的事件；也就是说，在无限张开的现实当中，将仍然不断遭逢以往的幽灵。这种“同义反复”的东西，是最本质的东西。鲁迅始终抓住这东西，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，则抓住其中的死结：“吃人”。所谓“吃人”，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，全然遭到剥夺；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，就是“轻视人，蔑视人，使人不成其为人”。然而，人们已经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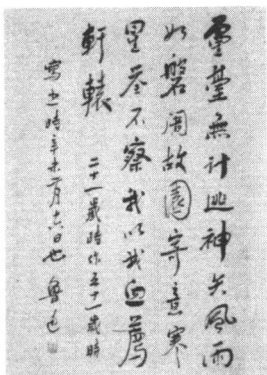


清朝末年，现代化变革主要经由两条路线进行：一是以当权派为首的“洋务运动”，一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“西学东渐”，即大兴翻译出版办学之风，推进思想启蒙运动。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（1825～1895）的著作《天演论》，于1898年出版，对中国知识界影响甚巨。



1902年，鲁迅作为官派生留学日本，次年带头剪去辫子——民族屈辱的象征。此为断发照，题诗云：“灵台无计逃神矢，风雨如磐暗故园。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1904年9月，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，后经“幻灯事件”而自行中辍学业，重返东京，为未来的文学事业积极准备。在此期间，撰文多篇。并与二弟周作人合译《域外小说集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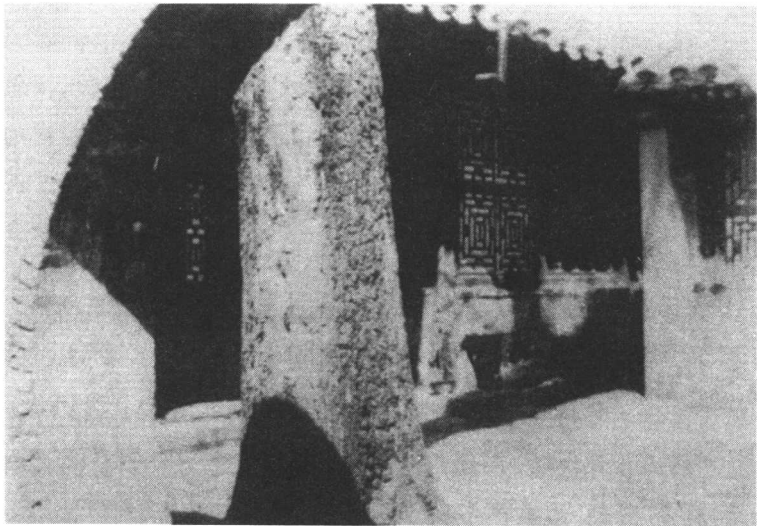
《自题小像》诗，
1931年书。



惯于奴隶的非人的处境，麻木，苟且，逃避自由。对于现实，一是不敢正视，二是善于遗忘。鲁迅所作的斗争，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，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。可怕的是，这期间，除了官方的布置，还有“同人”的合谋，以及民众的参与。鲁迅天生敏感，激烈，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。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，使隐蔽的东西公

开化，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，总之，他要使“黑暗的动物”现形，使“铁屋子”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，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，使真理自明。鲁迅的全部努力，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。所以，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，就会诧异地发现：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——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——的事实，已然包涵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，犹如先知的预言。

辛亥革命后，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，后随迁北京，寓居绍兴县馆内补树书屋。此间，读佛经，抄古籍，集古物，曾以“寂寞”、“麻痹”、“装死”等语形容。在《新青年》杂志编委之一钱玄同的催促下，创作中国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





鲁迅与周作人决裂后，由“八道湾”迁至西三条21号。此为卧室兼工作室，鲁迅戏称“老虎尾巴”、“绿林书屋”。



1926年3月18日，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和平请愿的学生群众数十人，是为震惊中外的“三一八惨案”。图为北京各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会场。

鲁迅发表《纪念刘和珍君》等系列文章，抗议反动政府，被列入政府通缉的黑名单。

我们是谁？人还是奴隶？我们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和权利？

鲁迅的存在，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折磨。这不仅仅因为他揭露了为人们所不乐于接受的世界的真实，而且还

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。1924年秋至1925年底，发生著名的“女师大风潮”。鲁迅在该校兼任任教，积极支持学生运动，并因此引发与教育兼司法部长章士钊的官司。许广平为学生领袖之一，及后成为鲁迅终身伴侣。



在于他总是以一种与人们相悖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这真实。无需斗争，或者简直厌恶斗争，应当算得上是幸福的罢？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，无视斗争的存在，往往出于奴隶的自欺。鲁迅终其一生，确实不曾背弃青年时期构筑的“人国”乌托邦；但是在现实中，除了确信自己做为奴隶以致奴隶的奴隶的经验之外，他怀疑一切。他把几千年的“东方文明”等同于僵尸，不相信一直为统治者编修的中国历史，说是“家谱”，不相信正统意识形态控制下的霸权话语。那些故作激烈，左得可怕的革命者，也是他所憎恶的。他反对蒙昧主义，而对中国的学者又往往抱不信任的态度，大约在他看来，其中多是“假知识阶级”，是喜欢给权势者帮忙或帮闲的。对于底层阶级，虽然一直是精神皈依的对象，却同样反对“迎合”，作“大众的新帮闲”。他承认自己的“多疑”，而且为多疑作过辩护。然而，这丝毫无改于斗争的确定不移的目标。准确一点说，鲁迅的敌人，都不是迎面而来的，而是来自上层，背后，内部，来自周围，带有“围剿”性质。所以，鲁迅的斗争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斗争，而是反叛，反抗，突围。他反叛社会，反叛所在的阶级，反叛集体，直至反叛自己。他清醒地意识到，中国的每一个人，既被吃也曾吃人；而他自己，也帮助着排筵宴，做“醉虾”的帮手。因此，他不断地使自己从权力和罪恶中分裂出来，脱离出来，成为相对于权力系统的密集网络的一个活跃的反抗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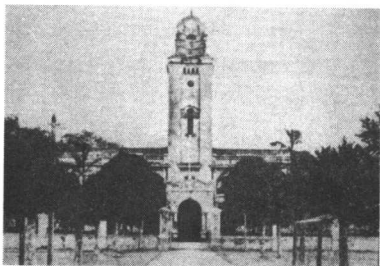
自从为革命的梦境所放逐，鲁迅选择了上海作为斗争的最后一道壕堑。从20年代到30年代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“兄弟阋于墙”，国共两党联合破裂。中央集权制度经过长期松弛以后迅速收紧，年轻的民国在一次大清洗中蜕变成

为“一党专政”的“党国”；随着民族战争的临近，专制与奴役在国家主权的庇护之下进一步合法化。作为反抗者，鲁迅加盟了反对政府的争取自由和人权的各种组织，其中包括左联。然而，就在这组织内部，产生了新的权势集团。鲁迅从中意外地遭遇了“奴隶总管”，“自有一伙”的压迫，孤立和打击。对此，他曾使用“横站”一词，表达后来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处境。正如自命不凡的才子所嘲笑的那样，这时，他写作的惟是不能进“艺术之官”——自然也不能进“学术殿堂”——的杂文。仅从鲁迅最后十年的杂文所取的材料，形式和风格的演变来看，斗争的情势，显然要比北京、厦门和广州时期更为严峻而急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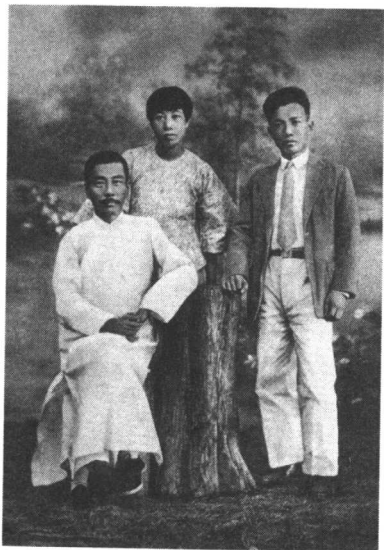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场绝望的抗战。那结果，鲁迅不但不曾丝毫动摇党国，反而成了党部呈请通缉之人；不但没有夺过“工头”的鞭子，“元帅”的军棍，这样的人物却照样挂帅，



1926年8月26日，鲁迅离京南下，到厦门大学任教。到厦门后，即寄此“厦门大学全景”明信片给已到广州的许广平。



1927年3月，鲁迅应聘至广州中山大学，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，许广平为助教。图为中山大学大钟楼。



鲁迅与许广平、蒋径三合影。1927年9月11日摄于广州西关图明照相馆。

照样“以鸣鞭为惟一业绩”，他的几个较亲近的青年朋友，都是给“实际解决”了的。而且，还有不断纠缠他的文痞、文氓、文探，种子绵绵不绝。鲁迅一生傲然独立，却是遍体鳞伤，过早地耗尽了体内的全部燃料。斗争的无效性，不免使人们又多出另一种折磨，就是：——

鲁迅的存在，其价值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吗？

1927年3月10日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，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。图为参加会议的执委合影。左起第一排：丁惟汾、顾孟余、徐谦、谭延闿、孙科、宋庆龄、宋子文、陈友仁、经亨颐、吴玉章。第二排：江浩、董必武、丁超五、邓懋修、陈其媛、于树德、彭泽民、毛泽东、林伯渠、朱雯青。第三排：周启刚、王乐平、王法勤、夏曦、詹大悲、陈公博、恽代英、邓演达、许苏魂、谢晋。

但是，由于党组织的集权性质，蒋介石通往最高权力之路不可阻挡。一个月后，蒋介石即发动“清党”，在一场血腥屠杀之后，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。



目 录

引言

1

国民党“一党专政”

24

反文学：“革命文学”

37

自由与人权

64

书报审查制度

80

专制与改革

106

知识分子的内战

1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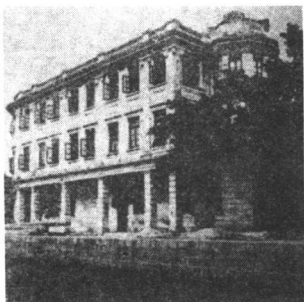
国家、民族、统一问题

国民党“一党专政”

五四运动过后，政党政治崛起，劳工运动随之上涨。在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过激主义的灼热的气浪里，共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。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。1923年，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。国共两党，都是在苏联直接派遣顾问，在苏共的建党原则的指导和支配下，进行系列的政治活动的。其中之一，便是国共合作。孙中山逝世后，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内的领军人物，他迅速抛弃已故领袖的容共政策，决心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势力。1927年4月12日，上海方面率先奉命行动，紧急搜捕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，并加杀害。在一个月內，被屠杀的人数多达数千人。4月15日，广州也出动了大批军警，对各个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实行血腥清洗。此时，凡国民党势力所及之处，都展开了“清党”运动。纯洁党组织成了独裁专制的遁词。4月18日，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“国民政府”。经过党内的几次不大不小的摩擦，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“接班人”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；他成功地利用了元老的力量和各派的矛盾，由一人把党政军大权统揽起来，并牢牢地掌握手中。

清党期间，鲁迅仍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职。自从踏足这块“革命策源地”以后，他对中国的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应当有把握地认为，不至于为一时的风云变幻所迷惑。然而，时

1927年3月29日，鲁迅、许广平移居白云路白云楼26号2楼。



局的发展竟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，他对国民党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动是抱有幻想的，虽然一样承认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，甚至发出过有人攀摘革命花果的警告，却根本不曾想到整个党和军队，会如此快速地掉转枪头，对付先前的合作者。政治家的野心，实在远胜于文学家的想象力。他从来未曾看见这样杀人的，北京“三一八”惨案仅杀掉四十余人，他已经说是“出离愤怒了”，如今何如？他用了“被血吓得目瞪口呆”的话，形容此时的感受。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道义感，他以辞职表示抗议，然后在一个名叫“白云楼”的地方蛰伏下来。可是，像他这样阴郁易怒的人，是注定做不成现代的隐者的；果然很快地，便接受了官方教育部门的夏期讲演的邀请，破门而出了。其实，稍早一些时候，当他为结集的《野草》写作题辞的时候，即宣告“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”，透露了渴望“烧尽一切野草，以及乔木”的决绝的信息。

大屠杀来源于一个新的传统，这是军权政治和党权政治的合流。对此，美国学者派伊说：“军阀给出了一个事实，即在现代中国，政治力量不可能与军事力量分离，以至于没有人能开出从中国政治屏幕中心消除军队的秘方。”民国以后，袁世凯正是以军事力量作为政治资本，窃取革命政权的；可是现在，军队已不复属于个人，而是作为“党军”，为党所控制。早在革命初期，孙中山在确立他的党权政治理论的时候，已经融入军权政治的因素，后来还曾一度以军权改造党权和政权，实行党政军一体化。事实证明，军事实力的过分膨胀是危险的。所以，自从在苏联引进党对军队的政治化的控制体制之后，军权便长此被置于党权之下；虽然党不能不依靠军事力量取得并维持其专政，但是始终

离不开“以党治国”的框架，其领导地位是不容挑战的。

鲁迅没有直接描述大屠杀的残酷性，而是透过“清党”事件，揭露独裁政治灭绝人性的本质。我们注意到，在1927年以后的两三年内，他反复使用“流氓”一词做演讲，或者写文章。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立场可言呢？无非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，自然，中国的政治也就是“流氓政治”了。鲁迅做过一个《流氓与文学》的讲演，从记述来看，其实讲说的多涉政治流氓。他指出，他们要“革命”，整天叫喊“打倒旧制度”，目的是要取得自身的地位；及至有了地位，仍然要拾起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。在著名的讲演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，他列举了曹操和司马懿，作为政治流氓的代表人物。一方面，是杀人的随意性；另一方面，是行为和议论相矛盾。曹操杀孔融，司马懿杀嵇康，都是以“不孝”为罪名的。魏晋以孝治天下，不孝，故不能不杀。“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？因为天位从禅让，即巧取豪夺而来，若主张以忠治天下，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，办事便棘手，立论也难了，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。”问题是，“曹操与司马懿何尝不是著名的孝子，不过将这个名义，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。”这便是政治流氓的“德治”。鲁迅使用反语，称颂曹操为“英雄”，说“我虽不是曹操一党，但无论如何，总是非常佩服他。”还幽默地说：“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，也没有人敢问他，我们倘若去问他，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！”利用传统的戏剧旁白或插科打诨的话语形式，不断暗示读者，使之把魏晋时代同现时代联系起来。

权势者极力使杀人合法化。因此，揭露合法化便变得十分必要而且适时。鲁迅在《小杂感》里说：“凡为当局所‘诛’者皆有‘罪’。”又著《可恶罪》一文，说是“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，所以枪毙或坐监的。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，是先因为被人认为‘可恶’，这才终于犯了罪。”执法者实际上无法可依，即使有法，本身也是不合法——自然法——的。由此，我们知道，在强制性的统

治之下，所谓的“法治”，是怎样一种不可靠的东西。《谈“激烈”》一文写道：“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。‘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’。这里以为平常的，那边就算过激，滚油煎指头。今天正是正当的，明天就变犯罪，藤条打屁股。”在这里，法律明显的不一律。《小杂感》里还说：“刘邦除秦苛暴，‘与父老约，法三章耳。’而后来仍有族诛，仍禁挟书，还是秦法。法三章者，话一句耳。”两千年一贯制，这就是专制主义的再生性和连续性。被鲁迅称为暴发户的革命新贵，在将杀人合法化的同时，必先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，因此也就一定要争正统。所谓正统，对内代表已故领袖的遗训精神，代表全党，对外则代表全民。可以说，正统之争是专制社会中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权力是赤裸裸的，它会把许多关于“忠诚”、“团结”之类的伪装自行撕成碎片，暴露自身的罪恶和肮脏。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争夺的过程，整个过程充满戏剧性，却又毫无“游戏规则”可言。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打比喻说，譬如有一个军阀，从前是压迫民党的，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，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，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，是总理的信徒。这样还不够，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。这时，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不去呢？不去，便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，于是定罪，杀人。鲁迅解说道，真的总理的信徒，倒会不谈三民主义，或者听人假惺惺地谈起来就皱眉，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。这在当时，对于高举三民主义旗帜，以党的正统代表自居的大小领袖的讽刺，可谓入木三分。

在“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”的时候，鲁迅不断变化他的讽刺艺术，发出抗议的声音。他有一段关于“革命”的绕口令一般的随感：

革命，反革命，不革命。

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。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。不

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,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,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。

革命,革革命,革革革命,革革……

混乱的局面。混乱的语言。“革命”仅仅作为一个口号被抛来抛去。在故意安排的言辞闪烁之间,杀机重复出现。这就是语言的张力。鲁迅说收在《而已集》中的文字,是受吓以后,“吞吞吐吐,没有胆子直说的话”;其实,他正好利用无法直说的模糊语言,作了明确而顺畅的表达。

“防被欺。”鲁迅说。他在大屠杀后写作的大量文字,都在揭露一个党的流氓性,虚伪性。他绕不开流血事件。这是他的最大的伤口所在。他告诫说:“自称盗贼的无须防,得其反倒是好人;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,得其反则是盗贼。”这是“推背图”式的方法,是由悖谬的生活逻辑推导出来的方法;在这里,他以特有的“世故”语言,为中国的政治伦理划分了限界。

早在“呐喊”时期,鲁迅便做过关于“暴君的臣民”的随感,这时,也仍然重复着“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”的结论。君臣关系,是东方政治文化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。在一个农业大国里,权力高度集中而等级森严有别,政治运作的规律,自然大不同于从工商社会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;而在“骄和谄相纠结”的“没落的古国人民”中产生的统治集团,也自有自己的精神特色。《扣丝杂感》中有一段“包围新论”,对此有着精彩的描述。文中说,无论何等样人,一成为猛人,身边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,使他变成傀儡,外面的人看不见他的本相,所见只是包围者制造的幻形而已。此时,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,而晦气的人物刊物之类也跟着遭灾。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,直到“龙驭上宾于天”。中国之所以永远走老路,原因即在包围,因为